

【主持人语】本期专题为“中原文化与云南边疆”。

《明清时期书院文化在云南边疆前沿的传播：以思普地区为中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历代“庄蹻王滇”文本叙事的演变》两文同研云南边疆，立足共同体视域：一篇写儒家文化如何“落地”边疆，一篇写历史记忆如何被史书“写进”云南，互相印证。

“书院文化”一文，将书院史引入边疆治理史。思普地区世居傣、彝、哈尼、拉祜、佤等族，长期土司分治。作者据方志学田、捐银、生员记录，将书院设立与改土归流相对照，揭示军屯、民屯、商屯支撑书院生源，总结“官方主导、梯度推进、层层覆盖”特点，提炼“文化先行、政治跟进、社会融合”模式，使“大一统”观念化为各族读书人的认同。

“庄蹻王滇”一文跳出真伪之争，将此故事视为历代史书不断添改的文本，考察其由《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演变为“最早与中原相通”的文化符号，认为“庄蹻王滇”叙事空间越写越大、时间越拉越长、结局各异，是共同体认同不断加深的史学反映。

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看，两文都以“边疆与内地如何连在一起”为中心，都落脚于认同建构，共同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既靠实实在在的社会往来，也靠绵延不断的历史书写。

(苍铭，云南曲靖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二级教授，研究方向为西南边疆史地)

明清时期书院文化在云南边疆前沿的传播： 以思普地区为中心*

胡国云¹，梁 荔²，孙卫新³，李其琛²，卜程洪²，梁可依⁴

(1. 昆明学院 党委办公室，云南 昆明 650214；2. 普洱学院 融媒体中心，云南 普洱 665000；

3. 普洱学院 发展规划中心，云南 普洱 665000；4. 泰国格乐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泰国 曼谷 10220)

【摘 要】思普地区地处云南边疆前沿，历史上长期由傣、彝、哈尼、拉祜、佤等世居民族土司分治，明清以前与中原儒学士大夫文化联系疏淡。明初平定云南后，卫所屯田、移民实边与改土归流等举措相继推行，思普地区由此从传统羁縻之地渐次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治理体系，书院、义学、私塾等也随之次第兴设。文章以边疆治理为分析视角，梳理明清时期书院文化传入思普地区的制度前提、社会基础与空间过程，归纳其传播特征。研究表明：军屯、民屯与商屯造就的移民社会，为当地书院建设提供了生源与经费；官方主导的办学传统决定了书院自上而下的设立次序；书院的空间分布沿景东—宁洱—思茅一线自北向南梯度展开，且与府、厅、县的行政层级一一对应，最终形成府级书院、厅县书院与义学私塾相互衔接的三级教育网络。书院文化的传播，一方面提升了边疆社会的识字率与科举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将“大一统”观念逐步内化为各族士民的价值认同，为此后改土归流的深化与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奠定了文化基础。

【关键词】云南边疆前沿；书院文化；明清时期；文化传播；思普地区

【中图分类号】K248；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6)05-0079-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6.05.008

一、问题的提出

书院向称“天下国家之元气”^①。元明以前，云南虽已有儒学之设，但多集中于滇池、洱海周边的腹里

* 【作者简介】胡国云，男，云南玉溪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经济教育；梁荔，女，云南普洱人，普洱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文化；孙卫新，男，云南曲靖人，普洱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汉语；李其琛，男（彝族），云南墨江人，普洱学院高级实验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卜程洪，男，贵州盘州人，普洱学院农艺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梁可依，女，云南普洱人，泰国格乐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

①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增订版）[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587.

州县,边疆纵深地带仍以“教化未周”为常态。^① 本文所谓“书院文化”,是指以书院为载体的儒家教育传统,包括教学制度、祭祀礼仪、学田经营与科举导向诸要素,兼及与书院功能相近的义学与私塾。

思普地区是云南西南部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地域概念,由“思茅”与“普洱(今宁洱)”两地名各取一字合成,泛指以普洱府(府治宁洱)、思茅厅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清代设普洱府,辖宁洱、思茅、威远、他郎等地,是滇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茶马古道的源头,普洱茶由此集散而得名。民国时期,这一带先后设普洱道、思普区等行政区划;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思普区”成为常用的地域称谓,范围大体涵盖今普洱市全部及西双版纳州,即澜沧江中下游以东、哀牢山以西的广大边疆地区。因此,“思普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承载着茶马古道文化、普洱茶贸易史和边疆民族史的多重意涵。它以思茅、普洱双城为轴心,辐射澜沧、景谷、墨江、勐海、车里(今西双版纳)等地,历史上是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过渡地带。今天行政区划调整为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但“思普”作为历史地理概念,在研究地方史、茶业史时常被沿用。^②

本文所指“云南边疆前沿”,即现云南边疆紧邻国境、介于内地与境外之间的沿边地带。明清时期,云南边疆前沿大致涵盖思普地区、车里、德宏(梁河、盈江、陇川)等滇西南、滇西区域。明初为经略西南边疆,明廷在云南布政使司之下广设土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宣六慰”羁縻体系——“三宣”指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六慰”指车里、缅甸、木邦、八百大甸、孟养、老挝六军民宣慰使司,其地跨今云南西南部及缅甸、泰国、老挝北部。这一地带山高谷深、族类繁多、土司林立,长期处于“内属”与“外附”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边疆的前沿,明清时期云南南部边疆的治理情况较为复杂,本文所论“云南边疆前沿”,侧重于思普地区这一以土司分治为基础、后续逐步纳入郡县体系的沿边地带。

学界关于明清时期云南书院与边疆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肖雄对明清云南书院的建设规模、规章制度与经费来源作了系统考订,指出云南书院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清代达230余所。^③ 张浩浩、王振刚从“文化治理”角度考察明清西南边疆书院,认为书院承担了凝聚士人精神、传播儒学、选拔边疆英才的功能,是王朝“文化治边”的重要路径。^④ 田景春通过比较明清两代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认为,清代办学力度远超明代,义学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大量设立,构成了清代云南教育的显著特点。^⑤ 王胜军专门讨论清代云贵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群体,揭示白、彝、纳西等民族的学人借书院讲学、创作以推动地方文化传播的现象。^⑥ 覃延佳、王越平考察明清云南学宫的设置与传承机制,强调以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体系是边疆士绅阶层形成的重要通道。^⑦ 陈晨则从清代书院与边疆文化治理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清廷对不同边疆区域采取差别化书院政策的策略。^⑧ 赵乃蓉以广西思恩府为例,讨论明清广西书院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实践。^⑨ 杨永福等对清代云贵地区的书院、义学管理及其经费来源也有专门论述。^⑩ 与本文研究论旨最为贴近的是孙浩然、袁堃针对云南永胜彝族社会儒学传播的研究,该文以边屯制度为框架,

① 周钟岳. 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学制考一)[M]. 昆明:云南通志馆,1949.

② 参见: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 思普沿边开发方案[M]. 民国三十四年(1945)铅印本. 昆明:云南印刷局,1945;黄桂枢. 思普区明清以来地方志修纂史考说[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55-60.

③ 肖雄. 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9-42.

④ 张浩浩,王振刚. 明清西南边疆书院发展与文化治理[J]. 三明学院学报,2023,(2):74-82.

⑤ 田景春.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21-127.

⑥ 王胜军. 清代云贵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群体论略[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30-37.

⑦ 覃延佳,王越平. 华夷之间:明清时期云南学宫的设置、传承机制及其象征意蕴[J]. 民俗研究,2023,(5):49-63.

⑧ 陈晨. 书院与清代边疆文化治理的走向[J]. 贵州民族研究,2018,(3):183-187.

⑨ 赵乃蓉. 试论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发展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实践:以思恩府为例[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5):91-98.

⑩ 杨永福. 清代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研究:以云贵地区为中心[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12,145.

梳理屯军、移民与彝族民众借助官学、私塾、礼俗实现文化互嵌的过程,提出“制度—传播—互嵌—内化—认同”的分析链条。^①

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书院在边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提供了重要参照,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两方面较为明显的局限:其一,研究视角多选取全省或西南区域层面的宏观维度,针对单一具体边疆府厅的微观考察仍较为欠缺,难以揭示不同区域书院传播的差异化路径;其二,研究区域多聚焦于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或特定州县,对边疆前沿地带的关注仍相对薄弱,针对该区域书院文化传播的专题性、路径性系统分析更为匮乏。就思普地区而言,现存方志与档案中留存的书院、义学相关史料并不匮乏,道光《普洱府志》、光绪《普洱府志稿》均设有学校门类,书院兴废、学田多寡、膏火来源皆有记载。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出现以该区域书院文化传播为主题的系统研究,更遑论从移民、屯兵与屯田相互关联的角度,讨论书院文化传入边疆社会的具体机制。已有的若干地方文史叙述多停留在书院名录的罗列层面,对其创建者身份、经费结构、生源构成及与移民社会的关系缺乏考释,书院文化传播与边疆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因此被遮蔽。本文即以思普地区为中心,探讨书院文化向边疆前沿传播的具体路径与机制,以期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将书院研究从“教育史”领域拉回到“边疆治理史”的语境中,围绕3个问题展开:其一,明清时期思普地区的治理格局如何为书院传播提供制度前提?其二,移民、屯兵与屯田如何构成书院传播的社会基础?其三,书院文化依托何种路径向边疆纵深传播,又产生了怎样的治理效应?与既有相关研究相比,本文的着力点在于,将书院设立的时间序列与空间分布,与卫所、汛塘、改土归流的推进节奏进行对照考察,并尝试用方志中的学田、捐银、生员数据等说明书院与移民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由此呈现出边疆“文教”与“武功”并举的治理面相。

二、思普地区书院文化传播的历史背景

(一) 明清思普地区的治理体系嬗变

明清两代在思普地区的治理体系经历了从“间接羁縻”到“直接管辖”的深刻嬗变,这一嬗变构成了书院文化传播的制度前提。

1. 明代:思普地区的治理体系构建

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大军平定云南,逐步将西南边疆纳入明王朝统治体系。^②面对思普地区族群众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明王朝采取“以夷制夷”与“流官参治”相结合的治理策略:在靠近内地的北部区域设置景东府、镇沅府等由流官管辖的行政机构;在南部边疆区域则保留原有土司统治体系,设置威远州、孟连长官司、车里宣慰司等土司治理机构。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既保障了中央王朝的主权宣示,又适应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

为巩固军事胜利成果,明王朝在云南全面推行卫所屯田制度。洪武十九年(1386),西平侯沐英奏请在云南实行军屯,明确“三分守城,七分屯种”的制度设计。^③思普地区北部的景东作为战略要冲,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式设立景东卫,驻军规模达5600人,连同家眷总计约2.5万人,主要来自江南、江西、湖广等中原文化发达地区。这些军士携带家眷世代定居,在驻地周边开垦屯田20余万亩,修建水利设施40余处,形成了独立于当地土著社会的军户社区。^④

军事屯戌体系不仅稳定了边疆局势,更成为中原文化向边疆地区传播的最早制度载体。卫所内部设立了专门的儒学教育机构。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下诏“云南诸边卫皆设儒学”,^⑤景东卫儒学随之设立,成为思普地区最早的官方儒学教育机构。军户群体保留了内地的文化传统,在与当地各民族长

① 孙浩然,袁堃.边屯制度下云南永胜彝族社会儒学传播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J].昆明学院学报,2026,(2):80-89.

② 张廷玉.明史:卷三(本纪第三·太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51.

③ 张廷玉.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兵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95-2204.

④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九(武备志三)[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期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传播到边疆社会。据《明史·云南土司传》记载,到明代中后期,景东府已出现“文教渐兴,风俗丕变”的景象,部分土司子弟主动入学接受儒家教育,文化融合的趋势初步显现。

2. 清代:思普地区的治理体系升级

清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正式设立普洱府,辖宁洱县、思茅厅、威远厅、他郎厅等地,标志着思普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体系。^①为巩固改土归流成果,清政府构建了军政合一的治理体系:在行政层面,设置迤南兵备道驻普洱府城,统辖普洱、镇沅、元江、临安四府军政事务;在军事层面,设立普洱镇总兵官,统辖绿营兵2300余人,同时在边境沿线设置塘、汛、关、哨等军事节点共127处,形成“点线结合、纵深防御”的军事控制网络。^②为解决驻军粮饷问题,清政府颁布《普洱府垦荒章程》,明确“内地贫民赴普洱垦荒,每户授田30亩,借给耕牛籽种,六年起科。”吸引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地大量移民进入思普地区垦殖,到乾隆末年,普洱府在册民屯户数已达3.2万户,开垦良田近80万亩。^③

清代治理体系的升级,彻底打破了明代以来土司对地方资源与权力的垄断,为书院文化的系统性传播创造了制度条件。流官政府将“兴学教化”作为巩固统治的核心举措,雍正十年(1732)普洱府设立仅3年,知府漆扶助即主持创建普阳书院。^④清政府还制定了优惠的科举政策,专门为普洱府设立学额,岁取文生员8名、武生员8名,^⑤学额数量与内地中等府级行政区相当,极大激发了当地民众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

(二) 移民、屯兵与屯田:书院文化传播的社会基础

明清两代在思普地区推行的移民、屯兵与屯田政策,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与经济形态,更构建了儒家文化传播的社会土壤,为书院建设提供了需求动力与经济支撑。

1. 军事移民与屯垦体系的文化传播功能

明清两代在思普地区构建的军事屯垦体系,本质上是一套集军事戍守、农业开发、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治理工具。明代卫所制度实行“军户世袭”制,进驻景东卫的军士携带家眷世代定居,形成了规模约2.5万人的独立军户社区。^⑥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南京、苏州、南昌等江南文化核心区,秉持“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对子女教育有着刚性需求。洪武二十八年(1395)景东卫儒学的设立,正是为了满足军户子弟的教育需求,这是思普地区历史上第一所官方儒学教育机构。清代绿营兵制下,普洱镇所辖兵丁同样多来自湖南、四川、贵州等内地省份,其家属随军定居形成新的移民群体。乾隆年间思茅厅专门设立的“营义学”,就是为绿营兵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⑦

屯垦体系的经济支撑功能,为书院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军屯实行“授田制”,每户军户授田20—30亩^⑧;屯田收入除供给军粮外,还专门划出“学田”作为教育经费。景东卫儒学即拥有学田1200余亩,年收租谷360石。^⑨清代民屯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屯垦规模,到乾隆末年普洱府在册屯垦面积已达78万亩,^⑩经济的繁荣为书院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普阳书院创建时,知府漆扶助通过“官捐+民

① 周钟岳. 新纂云南通志:卷十(沿革志)[M]. 昆明:云南通志馆,1949.

②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九(武备志三)[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③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七(赋役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④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一(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⑤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八(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⑥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七(武备志)[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⑦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⑧ 张廷玉. 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83-1885.

⑨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⑩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七(赋役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筹”方式筹集白银1200两,购置学田2400亩,年收租谷720石,^①保障了书院的长期运营。

军事屯垦体系的空间布局,也为儒家文化在思普地区的梯度传播创造了条件。明代卫所与屯田据点主要分布在思普北部的平坝地区,形成了该区域最早的儒家文化传播核心区;清代绿营构建的塘、汛、关、哨等军事节点,则进一步向南延伸到思茅、勐海等边疆区域,每个节点都成为小规模的文化传播中心。这种嵌入边疆基层社会的屯垦体系,使儒家文化突破了府县城池的局限,实现了向边疆乡村地区的渗透。

2. 民屯、商屯与文化需求的增长

明清两代民屯与商屯政策的实施,形成了规模远超军事移民的民间移民群体,其多元文化需求构成了书院文化向思普地区传播的核心社会动力。明代民屯以政府强制迁徙为主要特征。洪武二十年(1387),明王朝从湖广、四川迁徙25000户“狭乡”民户进入云南垦殖,其中约3000户被安置于思普北部。^②这些民户多来自农耕技术发达的湖广地区,有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传统,聚居形成的屯村往往自发聘请塾师教授子弟,到明代中后期,景东府已有民办私塾17所。^③

清代改土归流后,政府出台了更为优惠的民屯政策。雍正十一年(1733),明确“内地贫民赴普洱垦种者,每户拨给水田30亩或旱地50亩,官府借给耕牛、农具、籽种”,同时规定:“垦种200亩以上者,授予九品顶戴”。^④极大激发了内地贫民的垦荒热情。到道光十六年(1836),普洱府在册民屯户数已达4.2万户,总人口超过20万人,占当时普洱府总人口的40%以上。^⑤这些移民聚族而居,保留了内地的宗族制度与文化传统,为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往往合族出资兴办族学,仅道光年间宁洱县就新建族学12所。^⑥

普洱茶贸易的兴盛催生了商屯群体,为思普地区的书院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清代普洱茶被列为皇家贡茶后,每年运出普洱茶达10万担以上。^⑦大量来自江西、石屏等地的商人进入思茅、宁洱等地开设茶庄,形成了财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商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培养子弟进入仕途,积极捐资兴办教育。乾隆五十二年(1787)思茅同知萧霖倡建玉屏书院时,石屏商帮即捐银8000两,占总建设资金的70%^⑧;嘉庆年间开南书院扩建时,江西商帮捐助学田1500亩^⑨。商人还自发设立“宾兴会”等助学组织,筹集专项基金资助贫困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为书院的持续运营提供了稳定的经费补充。^⑩

3. 中央王朝的教化政策导向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的教化政策,本质上是“文化治边”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即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⑪的方针;针对边疆民族地区,他在洪武二年(1369)晓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不预教之,何由能化?”^⑫在此政策导向下,明王朝在云南普遍设立儒学,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接受儒家教育,推行“不入学者不准承袭”,^⑬强制推动土司阶层的文化认同。思普地区的景东府、镇沅府均在洪武年间相继设立府学,每年选拔15名土司子弟入学。^⑭

①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② 张廷玉. 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84.

③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④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七(赋役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⑤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七(赋役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⑥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⑦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八(物产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⑧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⑨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⑩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三(学校志二)[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⑪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⑫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⑬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⑭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清代继承并发展了明代的教化政策，将兴学教化与改土归流同步推进。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十疏》中专门提出“教化议”，建议“于各府州县设立义学，无论土民汉民，愿入学者皆准入学。”雍正改土归流后，清政府进一步强化了边疆办学的硬性规定，明确要求“凡新改流之府、厅、州、县，均须在一年内设立书院”；同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增加科举名额、设立边疆专项录取名额、免除贫困士子学费等。^①此外，明清两代还建立了完善的考核机制，将办学成效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教官考核以生员升学人数为定，地方官考核以书院兴废为要”^②，极大激发了地方官员兴办教育的积极性。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了思普地区书院体系的快速建立与持续发展。

三、明清思普地区书院的发展历程与空间分布

在移民社会形成与官方政策推动下，思普地区书院从明代萌芽，到清代兴盛，逐步织就了一张覆盖府厅县的教育网络。下文按时间先后顺序略述其发展脉络。

（一）明代：书院的萌芽

思普地区见于记载最早的书院，是景东府的明志书院，由弘治年间署知府胡光创建于府城东南的开南山麓，建有讲堂3间、斋舍12间，初招生员30名，以《四书》《五经》为课业。^③其规制直接参照内地书院，结束了思普地区无书院的历史。

万历年间，景东府通判尹学孔倡建新城书院，可容生员50人，专收边疆少数民族子弟。府志明确规定“凡夷民子弟愿入学者，免其学费，官府供给膏火。”^④书院先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待生员汉语熟练后再授经书，可视为思普地区启蒙教育的雏形。

思普地区这两所明代官办书院均呈现出规模小、分布集中、经费依赖官府临时拨给的特征。两所官办书院额定生员合计仅八十余名，且都位于景东府境内，与当时汉族移民的聚居分布格局相吻合。明末战乱，当地书院大多被毁，但其办学模式为清代所承继。

（二）清代：书院的兴盛

雍正设普洱府后，思普地区书院建设随即进入高潮，逐步形成以府级书院为核心、厅县书院为支撑、义学私塾为补充的格局。^⑤兹将主要书院的基本信息列表如下。

表1 清代思普地区主要书院

书院名称	创建时间	创建地点	创建者	历史地位
开南书院	康熙四十年（1701）	景东直隶厅	景东同知徐树闳创建	思普地区办院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书院，后设乡试考棚
普阳书院	雍正十年（1732）	普洱府宁洱县	知府漆扶助	普洱府第一所府级书院，宁洱地区文教中心
玉屏书院	乾隆五十二年（1787）	思茅厅	同知萧霖捐建	思茅厅核心教育机构，培养进士封汝弼等人才
凤鸣书院	乾隆六十年（1795）	宁洱县	地方官绅共建	宁洱县重要县级书院
宏远书院	光绪二十二年（1896）	普洱府	迤南道官员创建	后改为普洱中学堂，为云南近代教育先声

注：资料来源于光绪《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

① 蔡毓荣. 筹滇十疏（议教化）[A] 师范. 滇系·艺文 [M]. 清光绪十三年云南通志局刻本.
②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③ 郑绍谦, 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④ 郑绍谦, 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⑤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郑绍谦, 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书院之外,义学承担了面向基层的启蒙教育。雍正十三年(1735),思茅厅首任同知徐本仙于厅城四门各设义学一馆,每馆招生童20人,“无论汉夷子弟,年七岁以上皆准入学”^①;乾隆二年(1737),又在倚邦、九龙江、勐遮各设义学一馆,专招傣、哈尼、布朗等族子弟,^②官方教育机构由此首次进入土司辖地。边疆义学先教汉语识字与伦理常识,再授基础经书,务求实用。

私塾则为民间自办。据道光《普洱府志》所载,思茅厅有私塾8馆,宁洱县12馆,景东直隶厅多达三十六馆,遍布城乡。^③私塾的教学对象宽泛,既收科考应试之生,也教授仅需掌握识字、算账技能之童,满足了不同阶层民众的差异化教育需求。

府厅书院、基层义学、民间私塾的三级教育网络建立后,思普地区的整体识字率明显上升。据道光《普洱府志》,道光年间普洱府适龄儿童入学率估计在十分之一二,有该地哪怕是极边远偏僻之地,也几乎家家诵读诗书的描述。^④这类描述虽不免夸饰,亦可见文教普及之一斑。

四、书院文化向思普地区传播的基本特征

综观明清两代,书院文化向思普地区的传播并非零散的自发现象,而是与边疆治理的节奏高度合拍,整体呈现出官方主导、梯度推进、层级覆盖、与移民社会互动协同4个面相。

(一) 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

思普地区书院的创办者绝大多数为流官。在现存方志可考的清代书院中,由知府、同知、通判等地方官倡建者占十之八九。^⑤流官以兴学为治绩,形成了“到任即建学”的传统;地方官的去留直接关系到书院的兴废,这是边疆书院不同于内地书院的重要特点。

官方主导还体现在经费保障上。清廷规定书院经费列入地方财政,同时以学田、官产、劝捐等渠道作为补充。普阳书院创建之初即拨学田2400亩,年收租谷720石;道光三年(1823),思茅同知史斌捐银1200两建临街铺房14间,租金专充玉屏书院膏火。^⑥书院经费多由官绅共同管理,年终公布收支,以杜侵渔。

书院的师资与教学方向亦由官府掌控。山长由地方官选聘,须为品行端正、学有根柢的科举出身者。开南书院先后延聘诗人刘大绅、嘉庆进士张寅旦、曲靖府举人汤增美掌教,宏远书院亦聘光绪举人陈度为山长^⑦;普阳书院历任山长皆举人以上出身,其中嘉庆年间山长尹尚廉曾任翰林院编修^⑧。官府定期考核书院教学,生员的岁试成绩与山长的待遇挂钩,以保障书院始终沿着科举教育的轨道运行。

由于官方主导,思普地区书院的意识形态功能十分明确。书院定期举行祭孔、宣讲《圣谕广训》、推行乡饮酒礼等活动,把“忠君爱国”“大一统”观念灌输给边疆士子,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边疆治理的实践由此合而为一。

(二) 从北向南的梯度推进

书院文化的空间传播,沿景东—宁洱—思茅一线自北向南展开,与改土归流的推进方向相一致。

第一梯度是北部的景东。景东是思普地区设卫最早、军户移民最集中的区域,弘治年间即有明志书院,清代又建开南、保和、凌凤等书院,成为思普北部的文化重镇。其先行优势,既源于地理上靠近内地的区位条件;更在于卫所屯戍造就的移民社会,对教育有着最为迫切的需求。

第二梯度是府治宁洱。雍正十年(1732)普阳书院创建,为思普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书院,

①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②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③ 郑绍谦,李熙龄.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清咸丰元年刻本.

④ 郑绍谦,李熙龄.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清咸丰元年刻本.

⑤ 据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光绪《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至二十四《学校志》所载书院创建者身份统计.

⑥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⑦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三(学校志二)[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⑧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最盛时可容生员200余人。^① 宁洱另有凤鸣、宏远等书院及义学12馆、私塾24馆,^② 形成了思普地区最为完备的教育网络,在整个区域的书院传播格局中发挥了承北启南的枢纽作用。

第三梯度是南部的思茅及边境土司地区。车里土司辖境的倚邦、九龙江、勐遮等地亦于乾隆二年(1737)设立义学,官方教育机构首次深入边境^③;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同知萧霖创办玉屏书院,随后设义学四馆、私塾八馆^④。清末,勐海、勐腊等傣族聚居区亦出现零星私塾。

这种梯度推进的空间扩散规律并非云南思普地区独有。广西书院由桂东北向桂西南延伸,贵州书院由黔中向黔东南扩展,皆循“核心区—边缘区”的扩散规律。^⑤ 思普地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当地书院的设置几乎与行政建置的推进同步,呈现“一府设、一学立”的对应关系,体现出清廷“文教先行”的边疆治理明确意图。

(三) 层级化和体系化覆盖

思普地区的教育体系按行政层级排列,形成“顶层选拔—中层普及—基层覆盖”的结构。处于顶端的是府级书院普阳书院,面向全府选拔优秀生员,每年从各厅县遴选30名入院深造,生员享受官府膏火。据统计,清代普洱府中举者42人,其中36人曾肄业于普阳书院,占比逾八成五。^⑥

中间层为厅县级书院,如玉屏、开南、他郎、凤山等,面向本辖区招收生童,其中优秀者可保送府级书院。这类书院兼负社会教化之责,定期宣讲《圣谕广训》、祭祀孔子,成为地方文化活动的中心。

基础层是遍布城乡的义学与私塾。其中义学由官府主办,免费招收各族贫寒子弟;私塾则由宗族、商帮或绅士出资,深入偏远乡村。三级机构各司其职,形成“启蒙—中等—高等”的人才培养链条;同时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化教学策略:对精英侧重科举训练,对民众侧重伦理启蒙,既保证了儒家文化传播的深度,又扩大了教化的覆盖面。

(四) 与移民社会互动协同

书院传播与移民社会的形成互为表里,移民带来的教育需求是当地书院发展的原生动力。清代思普地区的移民多来自江南、湖广、江西、四川等地,他们普遍重视子弟读书。据道光《普洱府志》记载,清代普洱府在册生员中移民子弟占七成以上。^⑦

移民中的商人群体,为当地书院提供了持续经费。除前述玉屏书院、开南书院捐资事例之外,思茅“宾兴会”拥有资产白银3万两,先后资助120余名士子赴省城、京城应试,^⑧ 堪称“以商养文”的典型。

书院培养的本土人才又反过来巩固了移民社会的文化认同,并促进移民与当地民族的融合。道光年间景东厅傣族举人陶昌,曾任开南书院山长、景东直隶厅学教授,主持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万余亩,^⑨ 深受当地各族民众敬重。汉族士人与少数民族士人同窗共读、同榜应试,共享儒家文化价值,共同构成了清代思普边疆社会新的精英层。

这种双向互动使书院文化嵌入移民社会的结构之中,成为联结汉族移民与当地民族的文化纽带,形成了文化传播与边疆社会整合相互促进的格局。

五、书院文化传播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

书院文化的传播,在思普边疆社会产生了超越教育本身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思普地区的传统文教面貌,还参与了当地各民族群众国家认同的建构进程,为近代以来边疆与内地的整合提供了文化基础。

①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②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③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④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⑤ 张浩浩,王振刚. 明清西南边疆书院发展与文化治理[J]. 三明学院学报,2023,(2):74-82.

⑥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三十五(选举志一)[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⑦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⑧ 陈宗海. 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三(学校志二)[M]. 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⑨ 郑绍谦,李熙龄.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七(人物志)[M]. 清咸丰元年刻本.

(一) 推动了边疆文化教育的发展

书院建立之前,思普地区的识字教育长期局限于土司上层的小范围群体中。随着书院、义学、私塾相继兴办,当地教育资源逐步向社会各阶层开放。道光年间普洱府在读生员中少数民族子弟约占三成,^①教育覆盖面的扩大打破了过去土司贵族对文化教育资源的垄断。

书院还培养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才。景东开南书院培养的翰林刘崐、封疆大吏程含章(月川)、诗人戴家政,^②思茅玉屏书院培养的进士封汝弼,普洱宏远书院培养的举人吕志伊,他们或循科举步入仕途,或以诗文名世,其成才多受书院教育之惠。^③清代普洱府有记载的举人42名、贡生300余名,多受书院教育^④;地方诗文别集刊刻20余种。^⑤思普地区的文化影响力由边陲之地扩及全省。

清末兴学时,思普地区的书院凭借校舍与经费基础率先转型:光绪二十八年(1902)宏远书院改为普洱中学堂,为云南最早的中等学堂之一;开南书院、玉屏书院亦先后改为小学堂。^⑥传统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的过渡,为思普地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 强化了边疆各族群的国家认同

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儒家伦理。清代思普地区的书院每逢朔望都举行祭孔仪式,宣讲《圣谕广训》,传授“三纲五常”“修齐治平”之说,使“大一统”观念由官方话语渐次内化为思普地区士人群体的价值认同。这种认同的稳定性在清末边疆危机与政治变革中得到检验。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军武装入侵滇西片马等地,云南各族民众奋起抗英;思普地处滇缅边陲,亦深受英缅势力侵扰之患,士民同仇敌忾、声援义举。清末至民国初期,受书院教育滋养的思普本土精英,更是在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思茅籍举人吕志伊,早年肄业于普洱宏远书院,后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成为云南民主革命的重要先驱。可见书院所涵养的家国认同,在民族危急时刻已化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报国行动。

书院教育也促进了民族间文化壁垒的消解。汉族与傣、彝、哈尼、布朗等族子弟同窗共读,参加同一科举,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景东傣族举人陶昌与汉族诗人戴家政交谊深厚、共主开南书院讲席^⑦,即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佳例。

(三) 促进了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

书院文化的传播逐步消解了“夷夏之辨”所造成的文化隔阂。当儒家文化成为边疆各族共享的知识基础后,此前边疆与内地的文化分野渐被“文野之别”所取代——无论出身何族,只要接受儒家教育即被视为“文明”之列,这为边疆行政体制的内陆化创造了观念条件。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所以能在思普地区顺利推行,与明代以来儒学长期传播所奠定的文化基础不无关系。改土归流后,流官继续以书院推行教化,边疆各族民众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到清末,思普地区的行政制度已与内地无异,岁时节令、婚丧礼仪、通用语言亦渐趋一致。方志所称“夷汉同俗、语言相通”^⑧,即是这种融合的写照。

从边疆治理史的角度看,思普地区的治理经验可概括为“文化先行、政治跟进、社会融合”:先通过书院的长期文化传播逐步消解族群文化隔阂,再以改土归流等方式完成地方行政制度的整合,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层面的全面融合。这一推进次序降低了治理过程中的冲突成本,对后世边疆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郑绍谦,李熙龄.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学校志)[M].清咸丰元年刻本.

② 郑绍谦,李熙龄.道光普洱府志:卷十七(人物志)[M].清咸丰元年刻本.

③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三十五(选举志一)[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④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三十五(选举志一)[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⑤ 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一(艺文考一)[M].昆明:云南通志馆,1949.

⑥ 陈宗海.普洱府志稿:卷二十二(学校志一)[M].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⑦ 郑绍谦,李熙龄.道光普洱府志:卷十七(人物志)[M].清咸丰元年刻本.

⑧ 郑绍谦,李熙龄.道光普洱府志:卷九(风俗志)[M].清咸丰元年刻本.

(四) 当代价值与启示

明清时期书院在思普地区传播的历史,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一,边疆治理宜文教与军政并重。思普地区的治理经验表明,单纯的军事管控难以维系边疆社会的长久稳定,持续深入的文化建设才能真正赢得人心。其二,办学宜官方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清代思普书院既赖流官推动,亦赖商帮、士绅捐资,这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办学格局值得当代借鉴。其三,文化传播宜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清代思普地区推行的双语启蒙、分层教学、先识字后经义的做法,充分尊重了边疆多民族聚居的文化实际,可为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历史参照。其四,公共文化服务宜城乡一体。清代思普地区“书院—义学—私塾”的层级覆盖,使文化资源抵达最基层,这种普惠性的文化建设思路对当下边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六、结 语

明清时期书院文化在云南边疆前沿地区的传播,是中央王朝边疆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卫所屯田、移民垦殖与改土归流等构建了书院文化传播的制度前提与社会基础;官方主导的办学传统,自北向南的梯度推进,与地方行政层级对应的体系化覆盖,共同塑造了思普地区书院文化的传播格局。书院传播的深层效应,在于将儒家“大一统”观念逐步内化为边疆各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进而推动地方行政体制与社会生活持续向内地趋同。这一历史过程表明,文化认同是边疆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依托。进入新时代,借鉴历史经验,通过教育普及与文化建设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始终是边疆治理领域一项具有基础性、长远性意义的工作。

A Study on the Spread of Academy Culture in the Frontier Areas of Yunn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Centering on the Simao-Pu'er Region

HU Guoyun¹, LIANG Li², SUN Weixin³, LI Qichen², BU Chenghong², LIANG Keyi⁴

(1. Office of the CPC Kunming University Committee,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650214, Yunnan, China;

2. Converged Media Center, Pu'er University, Pu'er 665000, Yunnan, China;

3. Development Planning Center, Pu'er University, Pu'er 665000, Yunnan, China;

4.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Krirk University, Bangkok 10220, Thailand)

Abstract: The Simao-Pu'er region, located in the borderlands of Yunnan Province, was long ruled separately by tusi (native chieftains) of the indigenous Dai, Yi, Hani, Lahu and Va peoples, and had weak cultural ties with the 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 tradi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befor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fter the pacification of Yunna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garrison farming (weisuotuntian), the migration of settlers to border area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native chieftains by centrally appointed officials (gaitugui) were successively implemented, gradually incorporating the Simao-Pu'er region from a loosely administered dependency into the prefecture-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with academies (shuyuan), community schools (yixue) and private schools (sishu) subsequently established in turn. Taking border governance a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social foundations and spatial processes by which academy culture spread into the Simao-Pu'er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diffu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mmigrant society produced by military, civilian and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provided both students and fund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es; the officially dominated tradition of running schools determined the top-down sequence in which academies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cademies unfolded gradually from north to south along the Jingdong-Ning'er-Simao line, corresponding in one-to-one fash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prefecture, department and county, ultimately forming a three-tier educational network linking prefectural academies, departmental and county academies, and community and private schools. On the one hand, the infiltration of academy culture raised the literacy rate and imperial-examination competitiveness of borderland society; on the other, it internalized the concept of "grand unity" (dayitong) into the value identity of scholars from all ethnic groups, thereby laying a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deepening of the replacement of native chieftains by centrally appointed officials and for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borderlands with the interior.

Key words: frontier regions of Yunnan; academy culture (Shuyuan Culture);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cultural transmission; Simao-Pu'er region

(责任编辑:杨谨瑜)